

# 一种“创造性的新诗”

## ——《红楼梦》鼓词“子弟书”的流传和创新

晓宁

### ■ 阅读提示

■ 启功先生曾说,“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永恒命题。

清代说唱艺术“子弟书”是近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今天仍在传唱的很多鼓词篇目,版本来源就是子弟书。鼓词“子弟书”中,取材于小说《红楼梦》的为数不少。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是最早关注《红楼梦》子弟书的学者,他在1983年从车王府抄本、双红堂藏本、傅惜华藏本中选录27篇《红楼梦》题材子弟书编辑成册,开启了《红楼梦》子弟书研究的先河。1984年著名曲艺研究专家关德栋、周中明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子弟书从抄》,收录子弟书101篇,其中《红楼梦》题材达17篇。以《红楼梦》为题材的鼓词“子弟书”,是鼓词中的精华,在取材内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流传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继承、创新特征,值得思考和研究。

### 数量和分量是明清小说改编之最

鼓词“子弟书”题材的来源,学界公认有四大领域:一、元明清三代的通俗小说;二、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三、当日北京京剧所演的题材;四、当时北京社会风土人情。以傅(傅惜华)藏子弟书的比例为例,其中第一类:取材于元明清三代的通俗小说,主要有《三国志演义》17篇、《水浒传》14篇、《西游记》8篇、《金瓶梅》8篇、《红楼梦》24篇、《聊斋志异》15篇以及少数的其他小说的题材。第一类和第二类在子弟书中又是最多的,第三类和第四类不过十几种、几十种。《红楼梦》子弟书的数量在诸种被改编的明清通俗小说中居于首位,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分量。正如崔蕴华在《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中所评估的那样:“《红楼梦》是子弟书创作的丰富源泉,子弟书则是《红楼梦》艺术生命的延续。这种亲密关系造就了《红楼梦》子弟书的独特美学风范与文化内涵。《红楼梦》子弟书在现存子弟书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 具有较高艺术价值,雅俗共赏

鼓词“子弟书”的唱本采用北方戏曲、曲艺通用的“十三辙”,讲究平仄韵律,每两句一韵,不论回目长短,一韵到底。以典雅诗句为主,掺杂北方口语和俚语,充分体现了雅俗语言之间的亲和力。《红楼梦》子弟书也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但其最具价值的部分在于提升了鼓词的文学性和诗意化成分,《露泪缘》《全悲秋》《石头记》等篇

目堪称诗歌艺术的精品。傅惜华先生指出,“其意境之妙,恐元曲而外殊无能与伦者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此有更高的评价:“子弟书在内容上极为丰富多彩。它与弹词、鼓词相比较,在题材范围上要广泛得多……”胡文彬在《红楼梦子弟书初探》中指出,“在北方诸多曲艺曲种中,子弟书是最早取材于《红楼梦》,将这部罕世奇书介绍给广大下层社会的”,独具慧眼地看出了“子弟书”在《红楼梦》的流传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五、七和三”“四、四”,这两种句子是子弟书中最常使用的句式,加之其他类型的句式,构成灵活多样的子弟书结构。从变文、弹词、到鼓词、子弟书,“三、三、四”的句式逐渐减少,“三、四、四”的形式逐渐增加,这种微妙的变化体现了子弟书偏重叙事的特点和汉语词汇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化递进的特点,在诗歌史及汉语语言发展上具有创造性意义。

### 以言情和市井生活为主的内容题材

《红楼梦》子弟书的取材比较集中于宝黛钗的故事、晴雯的故事和刘姥姥的故事,此外凤姐、湘云、妙玉、紫鹃的故事也多有涉及。盖因这些人物内容的事性较强,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为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李爱冬指出,“从这些作品的改写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即改写者选写什么,为什么选这而不选那?这与当时的某种社会心理相关。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及各种观念,是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阶层或有时扩大为一代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以刘姥姥的故事为例,刘姥姥与贾府上下的关系,其实正是中晚期清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上下尊卑等级以及贫富之间畸形关系的代表性写照。《红楼

梦》子弟书在改编中对于题材的选择,与历史、时代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 版本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天津、东北

《红楼梦》子弟书的版本分抄本、刻本两种,抄本刻本并行。按,子弟书早期以抄本稍多,现存最早抄本为嘉庆二十年(1815)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最早刻本出现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名为《庄氏降香》。子弟书版本中的善本较少,主要原因是其抄写和刻印多出于实用性,制作上不甚考究。版本以北京为中心,大体集中于京、津、沈阳等地,民国以后,上海的书局也有刻印。“百本张”“别野堂”“乐善堂”“聚卷堂”抄本,会文书房、东都石印局、辽阳三文堂、盛经程记书坊刻本,风行一时。其版本分布情况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流传线路和主要流布区域。

### 同《红楼梦》的流传关系密切

鼓词“子弟书”与《红楼梦》在民间的普及关系密切。傅惜华在《子弟书总目》中认为,鼓词“子弟书”相传“始始于清代乾隆时”。作为北方鼓词的一个重要支流,其具体起源情况较为复杂,众说不一,大体可归纳为几说:一说,源自乾隆时征大小金川的阿桂部的军歌岔曲;一说,脱胎于满族传统祭祀活动;一说,是唐代变文出现后弹词、鼓词分化、传承的结果。中山大学的黄仕忠、李芳在《子弟书研究之回顾前瞻》中指出:“子弟书是从长篇鼓词中分化出来,主要以短段形式出现。其最早并不叫子弟书而叫‘段儿’。‘子弟书’之名是这一形式成熟之后的称呼……”此说大致与第三种看法同,值得关注。不管起源如何,可以判断的是,在乾隆中后期这种鼓词艺术形式便已成型并开始流行,且一直延续到道光光绪时代,这个时段也大体是《红楼梦》从刊印(1791)到逐渐在民间普及开来的过程。

### 一种“创造性的新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就以“创造性的新诗”来评价“子弟书”的艺术成就。他说:“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这段评论是新时期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探讨子弟书艺术价值的开端,此后,“艺术性”成为对《红楼梦》“子弟书”研究的一个重点。曲金良《略谈红楼梦子弟书露泪缘》、崔蕴华《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姚颖《论红楼梦子弟书对俗语的运用》《子弟书对红楼梦人物性格的世俗化改编》、陈祖荫《浅议韩小窗子弟书的艺术特色》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子弟书的诗性艺术进行了讨论。近年来,很多研究者还运用了新理论新方法。如刘嘉伟的《“子弟书”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接受》,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了《红楼梦》子弟书对于故事情节演进的处理手法,认为“内视点”是其写作的一个特点。“所谓‘内视点’就是把叙事的任务交给小说中的人物,透过人物自己的眼睛观看世界”。《全悲秋》的结尾部分,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这是典型的叙事文学笔法,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曾惯常使用。从这个角度看,“子弟书”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叙事诗”,是对中国古代叙事体诗歌的极大创新和弘扬。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便受到读者的喜爱,清嘉庆年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俗语。初时,只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真正为民间接受乃至家喻户晓,是通过鼓词等艺术形式的广泛传播,毕竟在那个时候,能读书识字的人是少数,而鼓词说唱艺人的演出是可以遍及城乡田野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永恒命题,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于文化本体和内在规律的研究,从而更多更好地汲取前人的丰富经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开拓既不失传统文化意蕴又能够在当代流传开来的文艺形式。



# 唐诗中的逍遥

高丽杨

说到逍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庄子。其《逍遥游》是逍遥精神的源头和最高境界。之后,魏晋玄学又沿着庄子开辟的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处世逍遥与适性逍遥的命题,而盛唐气象中呈现出来的逍遥可以称之为入世逍遥。

嵇康是三国以降最有影响的玄学家之一,他的道诗在六朝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通过作品援引大量道教意象入诗摹写他孤高自许的情怀;一方面,他又通过情感判断使这些意象成为被社会秩序拒绝的极端苦闷心理的载体。这种逍遥精神的身后,不可避免地要拖上一条苦闷的尾巴。

唐诗的逍遥与六朝相比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首先从初唐的孟浩然开始就已经显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质。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众所周知,孟浩然虽怀济世志,但以布衣终身。孟浩然的布衣诗人生活中,写了数量可观的访道诗。在《寄天台道士》这首诗中孟浩然写道:“海上求仙客,三

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囊露采灵芝。屣履葛苍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孟浩然的道诗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带有淡淡惬意和淡然的逍遥,无论是“长与世人辞”,还是“愿言解缨绂”的情怀,都不是采取金刚怒目或清冷孤寂的心态,而是淡定大度的坦然。甚至与其说有淡淡的忧伤,还不如说释怀一笑的坦然。孟浩然身上体现出的逍遥精神,可以看作盛唐后来者追慕逍遥精神的先声和铺垫。

王维是孟浩然的挚友,其作品中亦满含逍遥精神:“先生岁馀,五岳遍曾居。遥识齐侯鼎,新过王母庐。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玉管时来凤,铜盘即钓鱼。竦身空里语,明目夜中书。自有还丹术,时论太素初。频蒙露版诏,时降软轮车。山静泉逾响,松高枝转舒。支颐问樵客,世上复何如?”(《赠东岳焦炼师》)在这首诗里面,王维在一个跨度达千余载的时空背景下展开铺叙,通过对焦炼师的赞叹表达了他个人的历史之思。

李白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其入世逍遥的特点最为鲜明。李白追求道

遥有着文化上的原因,他早年在四川紫云山度过:“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袁丹丘山居》)。紫云山本是道教圣地,这样的环境不可能不对李白产生影响。“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之五)可见,逍遥的精神早在他的童年的潜意识中就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子,他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天性就是个诗仙,放荡疏狂,爱好寻幽访胜,一方面是游山玩水,一方面是求仙学道。“谪仙游梁园”(魏颢《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

然而,李白对世间的功业也是一样的热爱。不过,他的热衷方式跟一般人不同,选择了一种逍遥的模式。他不参加科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他结交权贵,却要选择一种“平交诸侯,长揖万乘”的高调姿态。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带漂泊,在他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于是他北上准备追随李光弼从军杀敌,但是中途因病折回。即便如此,在因为追逐世功而几乎忙得丢掉性命的时候,他还没有丢掉逍遥精神:“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

地。”(《江上望皖公山》)“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过彭蠡湖》)。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说:“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挚,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所云的盛唐之盛者,多就其风格的差别而言。这些人的共性却都有通脱和热情的一面,他们的通脱与六朝时期因“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通脱是不同的。这种温润而华美的通脱,就是盛唐气象在文统方面树立的形象,也成为盛唐文学为后人追慕的精神风貌。唐代的诗人懂得盛世,以功业、文学作为表达志义的工具,以其天纵的才性与时代的气候此呼彼应,以其独绝的文章风流树立了时代的高标,其高歌壮行成为盛唐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强音,最终结出了盛唐气象中绚丽的奇葩。显然,这朵奇葩的绽放,一方面得益于群贤荟萃,另一方面得益于盛世滋养。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中国文艺事业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杨雪

“回望过去十年,中国戏剧界充分发挥艺术优势、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戏剧工作者踔厉奋发,孜孜矻矻,生动讴歌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有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在认真学习二十大精神后这样表示,中国文艺事业未来可期,要增强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育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戏剧花朵,让中国文艺百花园姹紫嫣红、气象万千。新时代的戏剧工作者,要继续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创造出更

多戏剧精品力作,回应时代呼唤与人民期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构筑中国精神,主动担当起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历史使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濮存昕认为,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引领社会风气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兢兢业业、崇德尚艺,好好练功、好好演戏、好好创作,不断推出文艺精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神采,充分展现文化自信自强,做一名称职、专业、受观众欢迎的文艺工作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 学术的传承和发扬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修订本正式发布。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介绍,点校本“北朝四史”原由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唐先生是中国中古史领域的权威学者,著作等身。此次“北朝四史”的修订工作,仍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担,体现了学术的传承和发扬。继2017年《魏书》修订本出版后,《周书》成为“北朝四史”修订本中出版的第二种。

《周书》,共五十卷,包括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是唐朝令狐德棻等编纂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从公元534年北魏东西分裂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为止48年的西魏、北周史。其保存了不少与典章制度相关的史料,于东魏、北齐、梁、陈史事也多有涉及,还收录了一些书信、时策、诗赋等,是

研究北朝历史和中古文学的珍贵文献。由于唐以前记述西魏、北周历史的典籍都没有留传下来,就现存有关西魏、北周历史的资料而言,《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最为原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部,价值弥足珍贵。

《周书》修订负责人、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表示,《周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1451条,修订本删除旧校78条,新增319条,总计出校1692条,并修订改补原校数百条,修改标点数百处。《周书》修订工作,利用了点校本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的若干新资料、新成果,严格按照底本校勘的原则,订正原点校本存在的若干错误之处,谨慎增补删改校勘记,并按照修订体例规范标点分段,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学术环境下的延续与提升。

## 共建“未来文学”百花苑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近年来专注于“未来文学”研究,在他看来,“未来文学”就是在新时代降生的。

孟庆枢认为,未来文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基石,把人与自然、寰宇作为统一体或动态场域,将人的精神四元点(生命意识、创新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回归意识)的系统化作为思想核心,以文学为基点,进而探讨在科学技术的迅猛推进下人类行为和伦理情感的复杂变形,对人类发展尤其是挑战和危机作出预警。

他表示,就理论资源而言,“未来文学”坚持守正创新,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激活者,也是世界性知识体系中的积极借鉴者和洞

察者。就艺术功能而言,以言行事,积极对外传播,加强自身与世界,他们的理解与对话,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理念、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同时,在对未来文学的理论建构中孟庆枢还特别强调多维关系网络中的动态发展,如传统继承中的守正与创新,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易与不易、变中求真的哲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技的关系,生命至上、人类至尊的理念,数字经济、智能化社会的日新月异,关于想象力与对人思想的正确导向的双重关系等。每一组对立统一且充满张力的关系都意味着一个深刻宏大的研究视域,为未来文学的发展指明了学术方向。他希望,青年学子积极发挥创造力,以无畏的魄力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 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

本报记者 张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日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术随笔合集《识小录》。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深耕多年,该书可视为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缩影。

《识小录》由70余篇千字左右的文章组成,陈子善表示,“看似散漫,其实有一条贯穿的主线,即都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写现代人文史事的方方面面。”书中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不乏稀见版本、手稿、书信,即对鲁迅、周作人、张爱玲、郁达夫、徐志摩、巴金等大家名作及文人交谊进行了考证,如《郁达夫全集》种种、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鲁迅偏爱毛边本之缘由、巴金著作盗版本研究等;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如析述陈楚淮、陈雨门其人其文等,以恰文学史之遗。

陈子善介绍,书中文章属于微观

